试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还是史学界通常认为的中日民族矛盾只是“开始上升”？这一问题关系到如何认识 1931 年 9 月至 1935 年间中国社会历史主题以及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及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性质。本文试图论证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深入一步认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状况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表明九一八事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事件”或“局部事件”。它“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①]，即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灭亡中国的阶段。

第一，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即以武力灭亡中国阶段的开始。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基本国策。为实现对外侵略的目的，日本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扩充军备，加强对国民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制造侵略舆论。1894 年中日甲午之战，清政府一败涂地，日本攫取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并把侵略势力伸入到辽东半岛。1904 年，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进而夺取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许多特权，使其占领东北、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欧美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扶植军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2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阀张作霖，并利用袁世凯急于称帝的心理，提出了灭亡中国的“21”条。此后虽经1922年华盛顿会议重新确立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共管”，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事实上已为各国所默认。直到1927年，日本对华侵略活动从未稍止。在此期间，日本的基本政策是以武力为后盾进行经济侵略，但还没有达到以武力独占中国的阶段。其阶段性变化的关键，就政策制订而言，是1927年的东方会议；就政策实施来说，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

1927年6月，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加紧推行侵略政策。1927年的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提出了“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①] 它标志着急进的武力吞并“满蒙”、征服亚洲大陆的“田中政策”取代了以经济侵略为主、逐步蚕食中国的“币原外交”。东方会议的核心就在于“把满洲从中国本土中分裂出来”[②]，并决定了以武力解决的基本方针。会后，田中在上呈天皇的奏折中，明确提出了“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基本国策。《田中奏折》的真伪可以讨论，但《田中奏折》中所阐述的政策，已为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此后，日本侵华步步升级，1928年5月，日本出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6月，在沈阳皇姑屯炸死张作霖。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寻求出路，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快了侵略步伐。它们大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舆论，鼓吹日本与中国东北的“特殊关系”，否定中国对东北地区的领土主权。关东军为了制造在满蒙使用武力的机会，从1931年5月到6月，一直推行蒙古独立运动计划和间岛暴动计划[③]。虽然这些计划未能实现，但借口“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煽动仇华排华情绪，却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试探性预演。最后，终于制造了“柳

①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101—102页。
② 〔日〕小浦贯一：《森恪》第32页。
③ 参见〔日〕西乡桐作：《板垣征四郎》第157页。

条湖事件”，悍然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进攻。这既是日本大陆政策演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日本侵华政策进入公开武装侵略阶段的战略性起点。从此，中日两国间开始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战争。可以说，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中国社会中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第二，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超过了中华民族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

1840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处于帝国主义共同控制和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不能不存在着矛盾，为了维护它们的共同利益，在相互承认实力对比条件下，必然寻求和保持对华侵略的“均势”。1899 年，美国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旋于次年 3 月为列强所接受，使“均势”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格局。在这期间，虽然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日本）曾一再企图打破这种均势，但由于实力的对比和列强间复杂的利害关系，形势又一再被拉回到“均势”局面。 1985 年的“三国干涉还辽”和 1922 年《九国公约》的签定，都是非常明显的例证。然而帝国主义的矛盾毕竟无法调和，所谓“均势”，归根到底只是对实力对比的认可。甲午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在华势力急剧膨胀，为了实现“大陆政策”的侵略蓝图，它势必要打破列强在华的“均势”。九一八事变正是日本要以武力独占中国及列强在华均势被打破的标志。从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来看，日本以武力吞灭中国的行为，使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超过了中国与其他列强的矛盾，而成为最突出的矛盾。当然，九一八事变后，帝国主义列强仍企图挽回被破坏的均势，美国史汀生提出的“不承认主义”和李顿调查团的“国际共管东北”方案，就是这种企图的软弱无力的表现。但是，已经在远东处于优势的日本，再也不愿充当二等伙伴的角色；囿于 1929 年以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列强对远东事务无暇东顾；再加上列强抱有日本进攻苏联的幻想，因

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对日本采取了静观事态发展的纵容态度。这就更加助长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

第三，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形势，这种形势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规定和制约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趋势。

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也从未把它看成只是与地方政权的冲突，只是“局部”性和“地方”性的事件，而是把它作为推行“武力灭亡中国”根本国策的关键性一步。当时全中国各阶层人民，也没有把事变看成是一个“地方事件”。十九路军抗日将士认为“暴日占我东北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①“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尺，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之变更之目的”。② 甚至连佛门青年弟子也认识到：“当此困难严重，民族存亡之生死关头，不容静坐蒲团，依然闭目参禅。”③ 全国各阶层的民众觉醒，集中地反映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上。

日本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使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处于低潮状态的人民民主运动，在抗日的旗帜下重新高涨起来。沦陷的东北地区各阶级、阶层人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及其他各界爱国人士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在保卫中华民族的总目标下，各阶层人民的目的、要求和愿望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为民族求生存、争解放的政治潮流。

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大革命失败后政治上一度追随国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重新改变了政治态度。1927 年后，在国共斗争问题上，民族资产阶级一直主张“剿共”。九一八的炮声，使得他们在民族危机面前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以对

①《十九路军抗日通电》。

②《冯玉祥就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通电》。

③《北京佛教育青年救国会宣言》（1932 年 1 月）。

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①] 提出“当前中国将整个地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的决心，另辟和平的解决赤祸之路。[②]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同意共产党的主张，但在国破家亡形势下，它们要求停止国共内战，集中国力，共御外侮。同时也是要求国民党革新政治，开放民主，以调动各种抗日力量。这说明，抗日救亡成了他们政治态度的根本出发点。

深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国民党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和迫害，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义愤。在南京，举行抗日示威请愿的青年学生砸毁国民党党部，痛打外交部长，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这同在全国许多城市举行的要求抗日的集会一起，表明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结合在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壮大，显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段斗争是围绕着民族斗争而展开的。这一斗争呈现的抗日与反蒋统一起来的特点，给抗日民主运动带来了特有的标记和曲折性。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严重分化。从东北的马占山、冯占海、李杜、苏炳文的违命抵抗开始，到十九路军上海抗战、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长城抗战、察绥抗战、福建事变以及两广事变等等，表明了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对国民党当权派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和反对。诚然，上述情况各异，但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民党内部许多爱国人士和官兵，要求抗日救国的愿望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发生尖锐的矛盾，抗命和分化则是必然的。这些事件表明了一个客观事实，不抵抗政策不得人心，抗日则受到支持和拥护。因此，国民党内部分化

① 《国闻周报》第 9卷，第 4 期。

② 天津《大公报》，1933年 1月 21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基本特点，是在抗日与不抗日问题上的分化。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斗争，造成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严重危机，导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是蒋介石无视中日民族矛盾，一意推行妥协退让政策，同全国各阶级、阶层的抗日要求发生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的结果。

上述事实说明，抗日者得人心，不抗日者失人心，抗日与否，已经成为人们评人论事、褒贬时政的准则，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九一八事变后左右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我们提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

当前否认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的主要论点，影响较大的有两个。

有人引用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演讲中的论点，说 1935 年中日民族矛盾才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说：“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不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姑且把这种观点称为‘东北非本部说”。意思是说,日本占领东北,还没有侵略到中国本部,只有侵略到华北，即深入到中国本部，民族矛盾才成为主要矛盾。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和歪曲，第一，毛泽东在这个演讲中指出：“1931 年 9 月 18 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而且，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也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刘少奇也曾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已经开始超过阶级矛盾”[①]。第二，毛泽东的演讲是在瓦窑堡会议反对关门主

① 《六大以来》〔上〕第 807 页。

义的特定条件下，说明党内过去对中日民族矛盾认识不清，使“人们似乎觉得”日本“不一定再前进了”，根本不是说 1935 年前中日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第三，毛泽东所说的 1935 年日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这只是一种习惯用语，并不意味着中国东北不是“中国本部”。因为，在今天有意无意强调东北非本部说，实际上是把东北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领土未作同等看待，因而忽视了九一八事变的严重性质，而认为只是“地方事件”。这种说法从历史上看不符合实际，从现实上也许正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欢迎。对此，中共中央文件也曾有过明确的说明。如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曾指明“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本部各省（东三省在内）经济上绝无根本的不同”。

综上所述，我们对那种把东北划在中国本部之外，认为日本占领东北还不能构成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因而不把中日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观点，是不能同意的。

关于反苏战争问题，在 1931 年后共产国际和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的许多决议中，都认为日本侵略东北是“发动反苏战争”，或称之为“反苏战争的序幕”。直到目前，苏联史学界的许多论著，仍然一再强调日本攻占中国东北，是为了发动反苏战争。国内的某些论著，也有夸大反苏战争的危险的倾向。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想侵略苏联，这是事实，但是，一直未把对苏联作战作为第一目标①。这一点从 1932 年至 1936 年间日本对苏的军事部署看得非常清楚。日本和苏联在远东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如 1931 年 9 月日、苏远东兵力数字比例是 3∶7；1933 年则是 4.5∶9.5；1935 年则是 5.5∶17。日、苏在远东配备的飞机数字比例则是：1931 年为 90∶200；1933 年为 90∶350；1935 年为 90∶950。②

① 参见森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中译本〕第 41 页。
② 参见秦郁彦：《太平洋国际关系史》第 227 页。

当时，西方报刊也故意耸人听闻地散布“第二次日俄战争”的流言，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挑拨手段。事实上，直到 1934 年初，美、英驻德、驻日大使已在报告和日记中认为：日苏战争很少可能[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也一再渲染反苏。历史的实际进程说明，日本进攻的战略重点始终在中国，所谓“反苏”，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只是掩盖其起初战略意图的烟幕弹。其目的在于：第一，以反苏为烟幕，掩盖其独霸中国的企图，减轻列强对其施加压力，避免过早和过分地刺激英、美；第二，用以掩盖中日矛盾，模糊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视线；第三，利用国民党的反苏心理，削弱中国一切反共力量的抗日情绪，鼓励他们反苏反共，阻止中国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至今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人们在认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分歧。原因是什么？这是值得深思的。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剿共”战争，出现了激烈的阶级厮杀局面，这种阶级矛盾尖锐化的表象，似乎掩盖了中日民族矛盾这个历史主题。多年来，人们总是以“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为主线来阐述这段历史，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反而不大为人重视。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过程中，曾经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手法。对东北三省和热河是用武力直接占领；对华北则以“自治”的形式，妄图不战而得，它表现出日本侵华的渐进性和阶段性的特点。人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有时忽视了各个阶段的联系，认为侵占东北是一个阶段，分裂华北又是一个阶段，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又是一个阶段等等，这就容易割断日本侵华政策的一贯性和中日战争十五年的整变体性。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 5 卷第 238 页。

在传统说法影响下，有人总是片面强调共产党政策的连续性，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批判九一八事变后王明路线推行的关门主义策略的错误，一方面，又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怎能既是关门主义，又搞统一战线呢？甚至有的同志认为，如果否定1931年到1935年间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策略上的一贯性，似乎就等于否认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就会有损于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这就提出一个问题，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究竟是由王明路线的关门主义（有人称为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逐步“发展”和“完善”到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还是对关门主义政策的批判、克服和纠正的结果呢？这个问题关系到关门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模棱两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否定了关门主义政治路线之后，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在于全党（包括“左”倾路线时期的中央）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包括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来都不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党的正确，并非是根本不犯错误，而是能自觉地从错误和挫折中汲取教训，最后确定正确的路线，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当然，阻碍我们正确认识九一八事变后的主要矛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学术的，也有政治的。列宁曾说：“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①] 这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原则。

（原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49页。

论抗日战争的开端

1945 年 8 月，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取得了百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这场战争究竟起于何时？明确地说，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战争的开端，还是 1937 年七七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中日战争史的分期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认识 1931 年 9 月至七七事变的六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历史的主题是什么？是中日民族矛盾，还是国内阶级斗争？关系到如何认识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性质；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略到底是为了解决“ 满蒙问题 ”和“ 华北自治 ”的地方事件，还是其全面侵华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关系到怎样认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巨大作用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应该说，上述问题的结论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导致这些结论的基本前提却是模糊不清的。事实上，如果不是以九一八事变，而是以七七事变作为中日战争的开端，就不能为中日战争的研究和探讨确立正确的政治理论前提，就不能在错误的前提和正确的结论之间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客观联系，也就无法对两个事变之间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以及各种人物、事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公正的、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就是本文提出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出发点。

一

中日战争，是中日双方的战争，是一种双边行动。研究有关中日战争的任何问题——其中也当然包括战争的开端问题——都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并且要特别着重研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作为这场战争的侵略者一方，不但掌握着开始进行战争的主动权，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继续进行战争。日本灭亡中国的总的战略目标虽然无从改变，但是其对华侵略政策在不同时期内所表现的不同方式，却会使中日战争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并且必然要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容和形式对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和政治状况造成巨大的影响。

根据当前史学界的一般说法，是把 1937 年的七七事变作为中日战争的开端。在这里，我们如果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日两国的双边活动，这个“开端”就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一是中国全国性抗战局面的形成。这后一层含义，是符合七七事变后的历史实际的。因为虽然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各种形式广泛地进行着，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先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对苏区和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抗战并没有实现；、而前一层含义则是不确切的。因为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并非始于七七事变，而是开始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

史学界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地位，历来估计不足。某些著述虽然承认这一事变的重要作用，也只是所它作为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演变的背景，却又不去说明九一八事变究竟为什么会对国内的政治形势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中，为了掩盖事变的本质，只将九一八事变说成是所谓“局部事件”或“地方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件”。事变发生后，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在国民党营垒中，也存在着轻视东北和低估事变地位的倾向。但是，如果认为中日战争的开端是 1937 年的七七事变，而将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划入“十年内战时期”，那么，实际上也就等于视九一八事变为“地方事件”或“局部事件”，或者说，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及其以后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只看成局部侵略，而不是全面侵华。

九一八事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事件”或者什么“局部事件”。“1931 年 9 月 18 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①。它是日本军国主义不宣而战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日本很早就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幕府末期，日本武士阶级思想家吉田松阴即已提出“加紧进行军备……割据中国东北领土”② 的主张。明治初年，日本政府便开始着手制定对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计划。 1890 年，曾任首相和陆相的山县有朋在上呈天皇的奏折中提出了“中朝是日本的‘利益线’”，的观点。甲午战后，他又在《陆军兵备改革奏议》中提出了利用甲午之“胜利”，“开辟‘利益线’，称霸于东洋”的主张。至此，“大陆政策”初具规模。与此相一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日本侵略步步加深，经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后进”的日本不但挤进了列强侵华的行列，并且取得了在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此后，日本更利用欧洲列强准备和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天惕良机，大举对华扩张：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扶植军阀张作霖，并于 1915 年利用袁世凯急于称帝的机会，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还乘俄国十月革命之隙，取得了老沙皇在东北的部分特权。此后，虽然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在名义上恢复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共管”，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事实上已为各国所默许，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29 页。
② 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 2 册，第 6 页。

本对中国的扩张更是变本加厉。然而，就日本上述对华侵略活动的基本状况而言，一直是采取逐步蚕食，迫签和约，割地索款，强勒特权，建立侵略据点，逐渐扩大“势力范围”的方式，还没有达到以武力实行公开占领的阶段。这个阶段性变化的关键，就政策制订而言，是1927年的“东方会议”；就政策实施说来，正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1927年的“东方会议”标志着日本以急进的武力吞并“满蒙”，征服亚洲大陆的“田中政策”取代了以经济侵略为主、逐步蚕食中国的“币原外交”。会议的核心，是首先实现“满蒙”与中国的分离，继之以“满蒙”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的关内各省扩张，即《田中奏折》中所谓：“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东方会议”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步步升级。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日本国内不但经济状况急剧恶化，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面对危机，出路何在？1931年5月29日，侵华战犯板垣征四郎在第二师团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地说：“打开我国目前经济困难局面的根本政策，不外乎是向海外发展”，并认为“只有占领中国的东北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①]。这样，“东方会议”的既定方针开始进入实施阶段。为此，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极力否认中国对东北地区的领土主权，强调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鼓吹东北与日本的“特殊关系”，进行舆论准备；一面借“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煽动国内仇华排华的军国主义情绪，做试探性的预演，最后终于借口所谓“柳条湖炸车事件”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进攻，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这既是日本“大陆政策”演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日本侵华政策进入公开武装侵略阶段的战略性起点。中日间从此开始了

① 参见《太平洋战争史》（一），第254页。

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战争。

二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面临着“版图的色，国族垂亡”① 的“民族存亡之生死关头”②，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的“均势”，中日民族矛盾超过了中华民族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突出为中外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由此成为中国社会历史的主题。它决定着中日关系的性质，影响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制约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趋势。

首先，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从侵占东北到控制华北的整个过程表明，它的侵略手法虽然有所不同，但是“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无变更的目的”③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发动上海事变，接着侵占热河，进至喜峰口、古北口一线，危及平津，直至 1933 年 5 月《塘沽协定》的签定，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告一段落。表面上看来，军事进攻似乎暂时停止，但日本以武力灭亡中国的政策，丝毫未改变。促成这种局势的原因：第一，是巩固占领区的需要。其中包括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在东北建立起殖民统治。第二，是为了缓和列强的反对，减少阻力。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进攻曾遭到美国及国联各国不同程度的反对，然而东北确是列强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日本“特殊地位”的地区。日本发动对关内各省的军事进攻，不

① 《十九路军抗日通电》。
② 1933 年 1 月《北京佛教青年救国会宣言》。
③ 《冯玉祥就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通电》。

能不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①]。第三，军事进攻上的某种“缓解”，不过是妄图以政治、经济手段不战而得，逐步蚕食。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对中国侵略活动主要是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而政治控制又服从于经济的目的。与此相适应，日本向奉张勒取特权的要求也大都属于经济范围。因此，“满铁”这样的经济侵略机构在东北地区也就取得了比“关东厅”更为重要的特殊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不仅东北已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对华北的扩张，也完全是以武力为支柱。以所谓政治“分离”，促进华北地方政权脱离中国中央政府为主要目的。这种政治“分离”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与武装进攻仅仅是形式上的不同。日本政府策动“华北自治”的真正意图，“在于把该地区作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如徒然为扩大地区，或者一举而完成理想的分治而操之过急，反而会增加纠纷，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并且其结果会与……想法相反。关于分治的形式，不管名义如何，着眼于掌握实质，也要考虑南京政府的面子，使该政权在其授权形式之下，实际上承认华北联省分治，这种办法，最为上策”[②]。而这一时期的各种经济侵略活动，如华北走私等，都是为实现灭亡中国的直接手段。

其次，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为主的状况，使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仅日本侵略者从未把它看成只是与地方政权的冲突，而是把它作为“武力灭亡中国”根本国策的关键性一步，当时全国各阶层人民，也绝没有把它看成是“局部事件”或“地方事件”。这种认识集中反映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上。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自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处于沉寂状态的民族民主运动，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重新走向高涨，沦陷的东北地

① 参见：《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 1933年 1月 27日对参加“热河作战”的第六师团和第八师团的训示》，《土肥原秘录》，第 17 页。

②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 202 页。

区各阶层人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空前的民族危机使一切阶级、阶层的目的、愿望和要求都在保卫中华民族生存的总目标下统一起来。革命高潮本身就采取了民族运动的形式。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给抗日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错，抗日必须反蒋，反蒋为了抗日。这样，斗争的矛头便集中指向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表明了阶级斗争的目的始终反映出民族斗争的需要，从而形成了抗日与反蒋统一的特点，给抗日民族运动带来特有的曲折性。

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得大革命失败后追随国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改变其政治态度，它们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①。提出“当前中国将整个地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治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②，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完全赞同共产党的政策，而是要停止国共内战，集中国力，共御外侮。它们要求国民党革新政治，开放民主，以调动各种抗日力量。在这里，民族危亡成了他们决定政治态度的根本出发点。

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严重分化。这种分化，从东北的马占山等违命抗战开始，继之发生了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剿共”前线起义；察绥抗战；福建事变以及两广事变等。诚然，上这事件不能一概而论，但多数是在严重的民族危亡关头，国民党内部具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热忱的军政人员，要求救国抗日的愿望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发生剧烈冲突的结果。有的如两广事变，虽

① 《国闻周报》第 9 卷，第 4 期。

② 1936 年 1 月 21 日天津《大公报》。

然主要是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别，以反对蒋介石不抗日为旗号借机打击蒋介石，以此来争取舆论的同情和免受在国难中发动内争的指责，但是不管那种情况，国民党分化的界标，就在于抗日与不抗日。

事实表明，抗日者得民心，不抗日者失民心。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成为这一时期左右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斗争，造成了南京政权的严重危机，导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是蒋介石无视中日民族矛盾，一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同全国各阶级、阶层人民的抗日要求发生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的结果。

再次，九一八事变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虽没有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但是中国人民却一直以各种形式进行着艰苦曲折的斗争。这种自发的分散的斗争遇到了日寇的严重摧残。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抗日民主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蒋汪合作下被镇压下去。随后，在爱国有罪的压力下，抗日救亡运动仍然不断曲折发展。国民党的镇压，激起更大的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这就是“一二九”运动。谁也不会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六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但是却没有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其原因，不是这时民族危机还不够深重，中国人民不需要全民族团结一致的抗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扼杀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阻碍了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正常发展。不是这时不需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和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在民族斗争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延缓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日战争 15 年的过程表明，由于中国国内状况的复杂性和日本侵略的阶段性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曲折性。由自发的、局部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全民族抗战，正是它的具体表现。仅仅把全民族抗战才看做是抗日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